



中国共产党 历次重要会议集

• 下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历次重要会议集

· 下 ·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戴金生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

(下)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13,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7,000

书号 3074·691 定价 (六)1.05元

限国内发行

目 录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6月6日—9日)	(1)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1951年3月28日—4月9日)	(10)
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1953年6月—8月)	(18)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	
(1954年2月6日—10日)	(27)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55年3月21日—31日)	(35)
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	
(1955年10月4日—11日)	(4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	
(1955年11月16日—24日)	(53)
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1956年1月14日—20日)	(6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27日)	(69)
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	
(1956年11月10日—15日)	(88)

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扩大)	
(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	(9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58年5月5日—23日)	(104)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8年8月17日—30日)	(113)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	
(1958年11月2日—10日、11月21日—27日)	(119)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	(123)
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2月27日—3月5日)	(127)
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	
(1959年4月2日—5日)	(131)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	(134)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	
(1961年1月14日—18日)	(142)
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和北京工作会议	
(1961年3月14日—23日、5月21日—6月12日)	(148)
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	
(1961年8月下旬—9月中旬)	(157)
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16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962年2月21日—23日)	(177)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5月7日—11日)	(182)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9月24日—27日)	(19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	
(1964年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	(200)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年5月4日—26日)	(206)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8月1日—12日)	(217)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9日—28日)	(227)
中国共产党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31日)	(232)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1日—24日)	(239)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8月23日—9月6日)	(247)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日—28日)	(250)
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	
(1975年1月8日—10日)	(261)
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	
(1977年7月16日—21日)	(26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7年8月12日—18日)	(270)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22日)	(274)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	
(1979年9月25日—28日)	(281)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	
(1980年2月23日—29日)	(286)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	
(1981年6月27日—29日)	(290)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9月1日—11日)	(298)
编 后	(316)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6月6日—9日)

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已经在大陆上(除西藏外)取得完全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体会议,也是为准备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而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

七届二中全会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的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到七届三中全会的十三个半月内,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军事上的胜利。四月二十一日晨,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二十三日,我军一举解放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胜利进军,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到一九五〇年六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及其他若干海岛以外的所有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其次,是政治上的胜利。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立即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机构,建立了中央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全国大陆的统一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使人民翻身做了国家主人,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我国近百年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在外交上,得到了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并和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

第三,是财政经济上的胜利。国民党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面临着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和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投机资本家趁机捣乱金融,哄抬物价。一九四九年四月、七月、十一月和一九五〇年二月,物价有过四次大的上涨。这四次物价上涨,对于前线军队和全国人民的生活影响很大。人民政府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取缔了投机资本家,煞住了物价涨风。为了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人民政府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

管理。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三月十日，作出了《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和《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三月二十四日，作出了《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〇年度财政收入的决定》以及《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四月七日，又作出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的现金管理的决定》等。这一系列决定的基本内容，都围绕着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由于这些决定的实行，迅速取得了成效。一九五〇年三、四月以后，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向稳定，从根本上制止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这是建国后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个胜利，使新的人民政权站稳了脚跟，威信大大提高。这个胜利，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前提。

十三个半月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但摆在党面前的任务很多，而最根本的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形势紧张，困难重重。

首先，长期战争的破坏，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伤。由于通货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也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因而形成市场上若干货物一时的供过于求。加之革命胜利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的重新改组，使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和经营上遇到了许多困难，资金短绌，产品滞销，营业额大幅度下降，许多工厂、商店停工、减产或倒闭。当时国民经济的特点表现为“大国小生产，小生产又表现为很大的过剩”，存货很多，卖不出去。

其次，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组及其所带来的暂时困难，使资产阶级和我们的关系一时显得很紧张。他们怀疑共产党要实行社会主义了，惶惶不可终日，消极经营，乃至解散职工，关厂歇店，有的资本家甚至弃厂潜逃。武汉有的商人说：“挂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表现了内心的惶恐不安和对我们的不满。这时，失业的分子和失业的工人对我们不满意，一批小手工业者也对我们不满意。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改，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第三，在三亿一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实现，这是一个严重的任务。不完成土改，我们的政权不能巩固，经济不能恢复，广大农民的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但是，要实现三亿多人口地区的土改，我们遇到的敌人又多又大，他们会全力起来反对。“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①总之，这场斗争的严重性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针对这种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党必须及时地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因此，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七人，还有中央各部委机关、若干主要省市及中央人民政府的负

^①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

责同志四十三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开了四个半天，主要议程是五个报告：

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

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

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

会上，毛泽东还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

另外，还有三个专题报告：

薄一波关于税收问题的报告；

安子文关于党的组织情况及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胡乔木关于整党工作的报告。

此外，还有几个大行政区负责同志的发言。

由上可知，七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为此所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和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全会通过的毛泽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指出，十三个半月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收支的平衡，制止

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在老解放区，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然而就全国来讲，土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的现象还严重存在着，财政经济状况尚未得到根本好转。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全党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创造条件，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

报告提出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以及为此而必须做好的八项工作：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二、在巩固财政经济统一和稳定物价的方针下调整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三、在保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复员一部分军队人员，对行政系统进行整编；四、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五、认真做好失业救济工作；六、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七、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八、加强党的建设，进行党的整风运动。

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壮大自己，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也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制定战略策略方针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结合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充分论述了这个思想，并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讲话指出：“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

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这种情况如不迅速加以改变,将严重影响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任务的完成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决不可掉以轻心。党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一句话,就是“不要四面出击”。

在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所谓“有所不同”,就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处在领导地位,它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不同,要加以区别。但在其他问题上要按《共同纲领》办事,公私一样看待,有公无私是不对的,这就是“一视同仁”。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为了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还减去了许多税目。原税收项目一千一百多个,全会后减去了几百个,剩下三百多个,有些税率也减轻了。毛泽东指出,缓和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就是缓和了同工人阶级的紧张关系。私人工厂能开工,工人即不致失业。

在统战工作方面,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应当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无产阶级的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待遇上,要“一视同仁”。关于团结各界民主人士,毛泽东指示要认真地、主动地去做。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有些地方不敢放手发扬民主。有人对毛泽东说:“不敢讲呀!”毛泽东说,我们不怕人家讲,要广开言路,共产党员是不怕人家骂的,因为我们是在太阳底下做事。

在缓和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方面，毛泽东指出，改造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他说，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他主张缓进，主张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作这个工作。毛泽东提出，全国二十八所教会学校不要在里头教猴子变人。

在和少数民族关系方面，毛泽东指出，民族工作很重要，要谨慎地做，不要性急。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他们自己改。要训练少数民族干部。

在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方面，毛泽东说，有些地方光有宽大而无镇压，致使特务、土匪更加猖獗，老百姓批评我们是“宽大无边”。因此，要适当地施行镇压。但是，只要不是美帝国主义走狗，就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思想。

对全会提出的整风问题，毛泽东指出，整风也是为了团结四个阶级，缓和阶级间的紧张空气。有些民主人士总是称中央好，下级不好。他们说：“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所以我们要整风，整风是个重要环节。全党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整风，使全国都能团结，以工农为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还须要把它团结在我们的周围。

关于土地改革，毛泽东指出，这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条件。但这次土地改革与从前不同，即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个问题在全会中讨论的时间很长，许多同志都发了言。最后，毛泽东指出，这次土改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目的就是为早日恢复农村生产，有利

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这也是为了不要因土改又把阶级关系搞得过分紧张，特别是这次土改与前次的政治情况不同，前次土改是在武打中干的，是在紧张的战争情况下进行的，战争的锣鼓压倒一切；这次土改，大陆上的战争基本结束，三亿人口的地区（今年一亿多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从中国到世界是一件最惹人注目的事，土改的锣鼓压倒一切，所以这次土改，不动富农，不挖底财，不分浮财，使土改稳步前进，这对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七届三中全会，是党在建国初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对国内外形势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正确地制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纲领和战略策略方针，围绕着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这一根本任务，确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和政策，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七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三中全会的路线的指引下，党的各项工作迅速见效。五月间，武汉的工商业者已经改口说：“挂红旗五星已定，扭秧歌稳步前进”，高呼毛主席万岁。到一九五二年底，我们即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达到并且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国家财政收支迅速增加，收支相抵后略有节余。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同时，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在政治上，社会秩序安定，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人民民主专政得到加强和巩固，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全国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为在全国范围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1951年3月28日—4月9日)

自党的七大以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党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全国解放以来,组织发展更快。据一九五一年上半年统计,当时全国已有五百八十万党员,是七大时党员的四倍多,其中有二百七十多万党员,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新吸收的。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在全国已有二十五万个。

我们党自成立到全国解放,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伟大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无数事实证明,我党确是中国人民中最先进、最勇敢、最有纪律的部队。我们党内有数百万联系着人民群众的优秀党员,有许许多多久经考验的坚强干部,有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抱有无限忠诚的领袖。这些是我们党的主要方面。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确有某种程度的不纯。其主要表现是:在组织上吸收了一些不够条件的人入党,一些坏分子钻进了党内,甚至党的个别基层组织被坏分子或内奸所控制。在原有的党员中,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如缺乏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那种积极性和责任心,或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那种阶级立场和组织观念,或个人主义严重,居功